

09

~~11062~~

文史资料选辑

1980

第五辑

33



75/8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11962

文史资料选辑

一九八〇年第五辑

(总第三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八月

11.37
5068

中央關於城市工作指示

[illegible]

中央關於城市工作指示	（ 7 ）
中共中央關於發展城市交通的指示	（ 7 ）
上海工人要求罷工	新華社（ 10 ）
如何開展城市青年團組織工作	劉真一（ 14 ）
對內對外的宣傳	胡風（ 15 ）
沈鴻烈與學生運動	陳一（ 16 ）
沈鴻烈與學生運動	陳一（ 16 ）

賣品，代價於賣品內扣除。各款賣品應
負書賬目，凡賣出一項，應一併同志
保存，不得遺失。

(二) 凡賣品由本組心願讓與他人者，
其售價應與組織商量，即應有賣品生
一賣價，并須經該組同意，始能賣出。
治安區內各組應遵守。

(三) 凡每一賣品內附有賣主姓名者，
內須有本組印信，作爲證明。如無印信，
則須由本組立一收據，其收據內須有
賣主姓名，並有本組印信，方可下
賣。

(四) 凡賣品之售價，應由本組
決定，其售價應與組織商量，即應有
賣品生一賣價，并須經該組同意，始
能賣出。

(五) 凡賣品由本組心願讓與他人者，
其售價應與組織商量，即應有賣品生
一賣價，并須經該組同意，始能賣出。

(六) 凡賣品由本組心願讓與他人者，
其售價應與組織商量，即應有賣品生
一賣價，并須經該組同意，始能賣出。

(七) 凡賣品由本組心願讓與他人者，
其售價應與組織商量，即應有賣品生
一賣價，并須經該組同意，始能賣出。

(八) 凡賣品由本組心願讓與他人者，
其售價應與組織商量，即應有賣品生
一賣價，并須經該組同意，始能賣出。

(九) 凡賣品由本組心願讓與他人者，
其售價應與組織商量，即應有賣品生
一賣價，并須經該組同意，始能賣出。

(十) 凡賣品由本組心願讓與他人者，
其售價應與組織商量，即應有賣品生
一賣價，并須經該組同意，始能賣出。

第一版 救國日報

救國日報

救國週刊

上海工人

戰時旬刊

救國日報

救國週刊

上海工人

戰時旬刊

八。一三抗战时，上海出版的战时报刊



梁老太太及其孙女日夜为前线将士赶制棉衣



救护队在前线抢运伤兵



上海难民收容所热烈欢送第一批青少年参加新四军

八·一三淞沪抗战
时、在前线指挥的张治
中将军



八·一三抗战中我
军俘获的战利品



责任编辑 王有为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文史资料选辑

1980年第五辑(总第三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5 插页 4 字数 144,000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0

书号 11074·469 定价(六)0.71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华中局城工部三年·····	张承宗(1)
三上淮南·····	张 祺(28)
淮南抗日根据地办大学·····	舒 忻(42)
中共上海局的秘密电台和译电工作·····	朱志良(48)
抗战时期上海印刷工人的斗争·····	张心宜(53)
上海救国会七君子被捕案轶闻·····	谢居三(63)
抗战期间重庆的上层民主运动·····	祝世康(75)
芦沟桥前线采访追忆·····	陆 诒(81)
八·一三淞沪战役记略·····	史 说(90)
张自忠为国捐躯·····	阮玄武(102)
我向日方探和经过·····	姜 豪(119)
从我的遭遇看蒋汪合流·····	高鹤飞(127)
汉奸傅筱庵之死·····	郭 旭(131)
李士群与七十六号·····	王惠农(136)
我所知道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	胡宣同(153)
汪伪时期的《中华日报》·····	郭秀峰(166)
我在日军监狱的生活和见闻·····	张勇年 遗著(170)
关于抗战期间的殉难司法人员·····	何 武(180)
抗战八年大事记(初稿)上·····	本刊编辑部(184)

华中局城工部三年

张 承 宗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领导中共上海地下党（包括江苏地区）的江苏省委领导机关，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转移到淮南根据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成立了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历时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后，成立中共上海局和地下党市委。

华中局城工部的三年，在领导上海地下党坚持敌占区斗争和保护干部、培训干部、审查干部、整顿组织、开辟新地区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进行最后决战，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做了必要的准备。

十分悲痛的是：当时热情关怀支持上海地下党工作，经常予以亲切指示的革命老前辈陈毅同志和自始至终领导城工部工作的刘长胜同志，都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而与世长辞。在城工部时间最长、负责交通和教育工作的田辛同志，比较了解情况并保存了这两年的斗争史料，但他也被“四人帮”残酷迫害含冤而死。在回忆这三年的革命斗争史料时，他们的光辉形象时时浮现在眼前，令人怀念不已。

一、撤离上海

一九四〇年初，我从职委调到江苏省委情报委员会工作，担任

情委书记，史永（沙文汉同志的弟弟，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和姚家本两位同志是委员。江苏省委副书记兼社会部长刘长胜同志直接领导我们的工作。我和刘长胜同志经常到史永同志家碰头，商议工作。史永同志的爱人田菊英同志做些机关工作。当时曾在这个系统工作的，记得还有张心宜（较早撤退到根据地，现在上海市造船工业局）、柯执之、赵铮兄弟二人、郑振华（已故）、王大超（已故）、吴复培（已故）、黄征凤、袁锬田、张纪元、张子良、朱文蔚、梁万程等同志。在这段时间里，同志们对打入敌伪内部了解敌伪情况，保卫党的组织，做了一些工作。

一九四二年八月，刘长胜同志通知我，组织上调我到根据地去，要我把所属的党的组织关系都交出去，听候组织上派交通员送我去解放区。

我把柯执之同志的关系交给教育界的周克同志（现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柯原来在情委工作，帮我当秘书和交通，整理情报资料，并把下面的情报收上来，整理后经过江苏省委的交通联系，传递上去。她当时在一位社会知名人士的团体里当秘书，职业掩护条件较好。我有时到她的办公地点去和她联系。另一部分搞情报的关系，我交给史永同志，由史永同志转出去，还有些关系则直接交给刘长胜同志，由他去转。

当时我在一家银行当职员，走了以后，家属要留下来，我的弟弟困斋同志也留下来坚持工作。我只能说是患了肺病，需要离开上海往外地休养，向银行告病假，否则暴露了我是到新四军去的，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安全。安排就绪以后，刘长胜同志将交通员的关系约好交给我，并在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把我调离的原因和到根据地后的工作任务告诉我。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上海租界，上海完全被日伪所统治，环境险恶。日本统治者不允许有任何团体活动，不准有三人以上的任何集会。日本特务和宪兵机关千方百计要破坏我地下党组织。他们秘密地开黑名单，把抗战初期在社会上公开活动的抗日积极分子作为逮捕对象。中央为了保护白区干部，培养和训练干部，决定江苏省委机关撤到根据地去工作，区委以上的负责干部都要撤退。省委所属的上海、南京各地党组织，则留下部分负责干部就地坚持，采取分散的、个别联系的办法进行活动。群众工作采取“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式，隐蔽在群众之中，坚持长期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党依靠群众，创造了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冲破了敌人的各种限制与禁令，利用一切合法条件，建立了多种社会化的组织，勤学、勤业、交朋友的经验广泛运用，使我党能深入到各个产业、各个部门，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活动，党和群众更加紧密联系。刘长胜同志告诉我，刘宁一同志已在根据地，江苏省委的负责同志随后都要去根据地，要我到了根据地，先在淮南区党委总联抗所在地（义庄）附近的交通站，做上海撤退同志的接待和审查工作，然后再到江苏省委的训练班集中。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由交通员周晓华（现在上海市国防工办）和戚原（现在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同志护送去解放区。我接的关系是周晓华同志，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工人，身强力壮，举止很持重。戚原同志没有和我打招呼，他是暗的交通。我们从北站乘火车到南京，然后渡江到浦口，乘津浦路火车北上，下午二时许，在嘉山车站下车。这是个小站，但也有日伪军检查行李和验看身份证。我当时打扮成商人，穿着短衣长裤，手里拿个包袱，里面有两

套短衫裤，毛绒衫裤，一条被单，一些牙刷、牙膏之类，还有几包香烟准备必要时“塞给”日伪军。我用的身份证是六合县的，是通过伪军关系弄来的假身份证。日伪军看看身份证，望望我的面孔，就放我走了。走出车站，周晓华同志指点我前进的方向，翻过一个山岗，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离开一段路，装着互不相识的样子，各自赶路。一路很顺利，当晚在嘉山县边区的蒋家营宿了一宵。第二天赶到涧溪镇，区长胡坦同志（现在安徽省合肥）和交通站洪流同志接待我们，怕我才到根据地，走长途有困难，给我找了一匹栗色的马。到古城过了一夜，次日，周晓华同志一直送我到义庄。那时晓华同志患疟疾，但没有告诉我，幸亏我骑的是匹老马，“阁笃阁笃”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慢，晓华同志还能紧紧跟上。

淮南区党委的交通站，在离汉涧附近十五里的义庄，离区党委机关所在地很近。交通站由杨秉超同志负责，上海的交通联络点也设在这里。我到的时候，石榴同志（即石志昂同志，解放初期曾随周总理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在香港飞机上被国民党特务暗害牺牲）已先在。他负责接待事务，我负责干部审查。田辛同志于十月也来根据地，负责交通。

我们的交通联络点，在区党委交通站里占一间房子，草屋泥地，里面有两个炕床，上面铺草。我和石榴同志各睡一床，上海的同志来了，我们就让给新来的同志睡，我们铺一点草，睡在泥地上。但是许多新来的同志一定要我们睡在床上，他们自己睡地上。记得有一次来了两位女同志：吴涤苍和陈永箴同志，她们嘻嘻哈哈，高兴得不得了，硬是要睡在地下。因为我和石榴同志是先到的，学会了一些抗日歌曲，来的同志都要我们教歌。淮南根据地是新四军二师驻地，一部分在津浦路西，一部分在路东。当时就学唱《路东人民

之歌》，还有《新四军军歌》。物质条件很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昂，同志之间团结友爱，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亲如家人。到了根据地，的确象到了娘家一样，特别是石榴同志负责接待工作，积极热情，和蔼可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我在交通联络站，大约有两个多月时间，前后接待和审查干部百余人，大部分是区以上干部，经过了解，报告江苏省委领导（开始是刘宁一同志，以后是刘长胜同志）批准后，送到江苏省委举办训练班的地方顾家圩子。送往训练班是由交通员带的，我有时也带，如杨佩景同志（她长得矮而胖，当时大家称她“小皮球”）和季梅先同志两人就是我送到顾家圩子的。这些同志中，有一部分因为在上海已经暴露，回去比较困难，就介绍给淮南区党委分配工作。还有一部分是一般党员和少数非党积极分子，就在当地分配工作。区党委和二师都很欢迎从上海来的干部，其中有的是工人，有的是青年知识分子，都是根据地工作中所迫切需要的。我们在淮南，得到区党委刘顺元、李世农同志和专员公署方毅、汪道涵等同志很多帮助，我们也帮助他们输送干部和根据地需要的物资。可是也有个别负责人，自以为很革命，对青年知识分子采取嘲笑讥讽的态度。例如我们有时在晚上也参加地方的游击活动，有一位青年女同志夜行军时在路上摔到水沟里，他不但不热情帮助，反而经常以此作为笑料。到一九四三年，这位负责人自己却害怕根据地的艰苦奋斗，偷偷地逃跑了。

一九四二年十月，刘长胜同志由戚原和舒忻两位交通员护送来自根据地。他的行李较多，用一头骡子驮着，有一条棕色的毛毯，一件藏青色皮大衣。十一月，刘晓、王尧山（现在上海市委纪委）、赵先和张本（大家叫她丁小姐），还有潘汉年、何莘由仪征进

来。据说他们是从镇江渡江到仪征边区的，在镇江住了一夜，利用潘汉年在伪方的情报关系，送来边区的（文化大革命中，对刘、王等审查的问题之一）。他们行李很多，有两头牲口驮着，装束打扮也很受根据地人们注目。他们在淮南区党委住了一宿，我去看了他们。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去顾家圩子，潘汉年则去黄花荡新四军军部。

十二月，从上海撤退到根据地的区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已运送完了。我根据江苏省委指示，到顾家圩子集中，设在总联抗的交通联络站就告结束，田辛同志仍负责交通工作，石志昂同志由江苏省委决定派去顾家圩子学习，后到新四军二师师部工作，一九四三年初又重新派回敌占区工作。

二、顾家圩子——江苏省委干部训练班

江苏省委所在的地方，属于淮南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第二师的驻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新四军军部从盐城移到淮南根据地天长县铜城镇附近，地名黄花荡，华中局领导机关也在这里。华中局决定江苏省委驻在新四军军部西北二十几华里的泥沛湾，附近有个大庄子叫顾家圩子，作为举办干部训练班的地点。铜城镇在顾家圩子东北二十多里，是边区的一个贸易中心，离开敌人占领的天长县城约有五十多里。顾家圩子是一个较大地主的庄屋，地主已跑掉，主要房子有两进，都是平房。一进较大的房子旁边有个碉堡式的炮楼，里面有三、五间房子，由江苏省委的领导和原来搞机要工作的干部居住。另一进在东边，正屋有三、四间，地主的儿子和媳妇住在正间，一部分女干部住在他们的堂屋里，另外有一部分搞秘书、后勤等工作的干部住在过道旁的一间房里。此外，还有偏屋两

间，有老百姓住着。屋子旁边有个打谷场，场边搭了几间茅草屋子，警卫班的战士住着，有一间是交通员住的，里面还有架手摇电话机。还有一部分干部分散住在附近的一些小庄子里。

江苏省委领导同志一共有五位。刘晓同志是书记，刘长胜同志是副书记，刘宁一同志负责工人工作，王尧山同志是组织部长，张登同志（即沙文汉同志）是宣传部长。他们都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在白区，大家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职务，只知道他们是上级领导。在顾家圩子，上海地下党第一次有这么多的负责干部聚在一起，济济一堂，共有一百几十人。大家对领导很尊重，关系很亲切，称呼很随便，相互称同志，叫老刘老王的。大家对三刘，背后还亲切地叫刘晓为“老刘”，长胜为“胖刘”，宁一为“瘦刘”。

江苏省委干部训练班总的由刘晓同志负责，组织工作由王尧山同志负责。文化界的关键夫同志担任秘书，老关的爱人赵佩珍同志担任后勤事务工作，吴涤苍同志（又名吴泽均）和应仁珍同志担任医务工作，大家叫吴涤苍同志为吴医生。华中局很关心江苏省委干部训练班的安全，派了一个警卫班做保卫工作，给江苏省委领导同志都配备了警卫员，还派了通讯员。有位连长负责领导警卫工作，同时又为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当军事训练的教练。

干部训练班分四个支部，一个支部是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和机要工作人员，一个支部是学生界的干部，一个支部是工人界的干部，还有一个支部是职业界和其他方面的干部。到现在三十八年过去了，有些情况已记不清楚，只记得学生界的同志比较多。王尧山同志兼一个支部书记，老关同志也是一个支部的书记，我是工人界的支部书记。

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和机要人员的支部有十余人：刘晓、刘长胜、刘宁一、李莲香（刘宁一同志的爱人，现名李淑英）、王尧山、赵先（王尧山同志的爱人）、张登、蒋林根（大家叫他“蒋木匠”，现名涂作潮）、杨健生、梁毓哲、朱志良（现在江西省景德镇市工作）、陈永箴（陈小梅，绰号“小白兔”）、阿曾、阿叶等同志。

学生界的支部有二十余人：顾以佶、顾以佩、张本、李琦涛、刘启林、高景平、钟石川、王伟业、侯裕民、潘文铮、吴涤苍、黄素痕、季梅先、杨佩景、谭峨谷、吴学谦、马飞海、陈一鸣、严家裕、陈向明、王涵钟、钟惠群（钟沛璋）、大吴、小吴等同志。

工人界的支部也有十余人：陈公琪、王群、张祺、孙明、顾松盛、范小凤、顾莲英、俞宝琴（现名袁丽芬）、王立（王烈豪）、徐伯晖等同志。

文化界和职业界的支部有十余人：老关、老赵、梅益、唐守愚、吴小佩、张钢（即韩述之）、梅洛、应仁珍、钱天常（即钱正心）、王津、康善贤（李大）、小周（大新公司支部书记）等同志。

有些同志担任交通工作，有的没有编入支部，有的临时参加原来所属部门的支部。这些同志有钱伯荪、丁祖宪、周晓华、赵茅兴、田辛、何莘、俞敦华、张征秉、戚原、高骏、舒忻等（事隔三十八年，可能记得不尽正确）。

干部训练班从一九四二年八月开始集中，参加的有一百几十人。十二月正式学习，到一九四三年春节后，大约二、三月间结束。谭震林、张云逸、方毅、刘顺元等同志来做过报告，饶漱石也到过顾家圩子。学习开始，开过全体大会，由刘晓同志做动员报告，要求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总结工作。学习的文件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三

篇文章,还有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边学习,边总结,每个干部根据本身工作的实践,总结抗战以来的主要经验。如关键夫、梅益等同志总结文化界工作的经验,工人、职员、学生界的同志都分别总结职工运动、学生运动的经验。当时江苏省委很强调组织大规模群众团体的工作,作为专题来总结,我被指定写大团体工作的经验,陈一鸣同志也写了学生界方面大团体的工作经验。我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在党刊《团结》上,用“李却”的笔名写过大团体工作的经验,在干部训练班里,又根据银钱业联谊会、保险业联谊会、中法校友联谊会、洋行华员俱乐部等工作实践,进一步总结了经验。主要内容记得有:(一)充分利用合法条件,广泛地组织群众,利用原有的社会组织或成立各种灰色社会团体;(二)从群众的实际水平出发,教育群众,从低到高,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党的主张;(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四)深入参加团体的各个产业内部,发展党的力量。过了一个月左右,刘晓同志又召开过一次全体干部大会,总结了这一阶段的工作,并对认真总结工作的同志和工作较好的支部进行了鼓励和表扬。这些总结材料都由城工部刘长胜同志保存,一九四五年八月刘长胜同志重新回上海工作时,交给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收存。

干部训练班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每天一早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上早操,跑步,步枪射击,丢手榴弹。晚上要轮流站岗值班,练习夜行军。

文娱体育活动很活跃,因为全是年轻人,最大的也不过三十来岁,一般都是二十岁左右,职工方面的干部平均年龄略高一点。青年学生干部唱歌跳舞最为活跃,每次娱乐晚会,歌声不绝。最受欢迎的是顾以侔同志唱《延安颂》,李琦涛同志唱《夜半歌声》,刘起林